

绪 论

一、比较经济学的由来与发展

比较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它的出现虽然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但其思想渊源却要久远得多。

（一）比较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当一种经济制度或体制的弊端已经暴露并给社会带来严重损害时，总会有人，首先是某些先进的思想家站出来强烈谴责它，并提出某种新的经济制度或体制的方案与之相对照，力图引起广大群众对新社会的向往，推动并实现社会改造。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是最早提出各种新的理想的社会经济制度蓝图，以抨击和鞭答资本主义和一切阶级对抗制度的一批思想家。

16 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资本主义所谓“羊吃人”的原始积累时期，就已看到资本主义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因此，他所设想的“乌托邦”社会是一个实行公有制的社会。在这里，不仅生产资料、而且消费品也归全社会所有，甚至住房也是每 10 年采用抽签方式调换一次，以防止人们产生私有观念。“乌托邦”社会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人们直接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资本主义世界到处追逐货币财富，乌托邦人则视金银为贱品。对此，莫尔在其书中作了

生动描绘：“公家厅馆和私人住宅的便桶溺器，以及其他污物的容器，倒系用金银做成。锁在奴隶身上的长链大铐也是金银做的。最后，凡犯了罪变成不名誉的人，都是耳朵上挂着金圈，手上戴着金戒指，项上系着金链，头上扎着金箍。”^①“乌托邦”社会的决策者是一批有特权不参加体力劳动的社会管理人员，但他们决不是豪门贵族和寄生虫。

17 世纪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康帕内拉也设计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相对照。他在《太阳城》一书中对这一理想社会的经济特征作了描绘。在这里，人们实行公社制度，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均为公共所有。住房每隔半年重新分配一次。都在集体食堂用餐，食谱由医生安排。这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不再用于生产货币，而用来制造各种器皿。“太阳城”居民人人劳动，没有主仆之分。但执掌政权的是宗教祭司，不是具有科学知识的管理人员。

18 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和马布里也都从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出发，主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摩莱里描述的理想社会里，“人人都有责任使土地丰收，没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田地，这是我的黄牛，这是我的房屋。”^②但他主张享乐品和“日常劳动”所用的小工具归个人所有。在这里，没有商品交换，只有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才采取商品形式。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住宅式样相同；同行业服装颜色一致；30 岁以下的人都穿衣料相同的服装等等。马布里不仅设计了一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的

① 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中译本，第 78 页。

② 摩莱里：《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 1959 年中译本，第 146 页。

理想共和国，而且提出了一套经济改革纲领，如改革税制，取缔豪华，禁止经商，取消公务人员特权，限制大地产和其他财产继承权等等。

19 世纪三大空想家——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及英国的欧文对于社会主义^①与资本主义的比较，虽然仍属乌托邦主义，但他们的思想却更为深刻和系统，并开始付诸实践。第一，贯穿了历史主义观点。资本主义的维护者总是把这一社会宣布为永恒的社会，19 世纪的伟大空想家们却以自己设想的历史阶段划分力图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终究要让位于一个新的理想社会。圣西门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比做数学上的“级数”，每个历史阶段都是级数中一“项”。这个级数，“前项是过去，末项是未来”^②。他没有像摩莱里和马布里那样把原始社会美化为人类的“黄金时代”，而认为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他还认为，中世纪的封建制优于古代的奴隶制，资本主义阶段虽是必要的，但也像过去的任何一种制度一样是“过渡时代”。未来社会是科学的实业社会，目前的社会是从“神学和封建体系”向“科学和实业体系”过渡的中间阶段。傅立叶则离奇地认为，全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共八万年，分为四个阶段（即童年、成长、衰落、凋谢阶段），32 个时期。他以人类社会由低向高的发展规律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宣称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必将被未来的“和谐制度”所代替。他们的历史理论虽然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

^① 1827 年欧文主义者在《合作杂志》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者”这个词称呼欧文合作学说的信徒；1832 年圣西门派则首次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表示圣西门学说的特征。

^② 《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90 页。

毕竟以历史主义观点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击中了资本主义“永恒论”的要害。第二，他们站在经济发展的立场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圣西门尖锐抨击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它是“一切灾难中的最严重的灾难”，是引起其他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傅立叶则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散性中寻找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深刻原因，并且，由此引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欧文肯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且明确指出这一制度已经成为“力量无限的新的生产力”^①发展的障碍。这样，三大空想家就在实际上从对生产力作用的高度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从而，使得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深刻和有力。

三大空想家对于未来新社会不仅进行了规划和设想，而且力图以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圣西门四处呼吁，求助于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甚至劝说法国皇帝拿破仑支持自己建立未来的“实业制度”。傅立叶及其门徒曾于 1832 年按照他设计的“法郎吉”蓝图，在塞纳—瓦兹省的一块 500 公顷的土地上，进行了小规模试验，组织了一个农场，参加者 150 人，企图通过这样的组织把人类引导到“和谐制度”。欧文于 1824 年带领他的四个儿子和一些门徒，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了一块三万英亩的土地，建立起他的“新和谐”公社。约 1000 人参加了这次试验活动。其后，他又为改组当时的流通制度，于 1832 年在伦敦成立“劳动公平交换”商场，1839—1845 年继续组织了“和谐大厦”和“皇后林新村”。当然，伟大空想家所有这些试验都以失败而告终。

^① 《欧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52 页。

三大空想家对未来社会的设计方案都保留了商品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因素。在圣西门的“实业制度”中，私有财产及其取得收入的权利仍然存在。实业家掌管国家财产并进行经济决策，而实业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资产者。在这里，生产的主要调节者是计划，但要通过银行来组织、联结和调节社会生产活动。为了鼓励人们把才能贡献于社会，他主张“按才能评定报酬”。在傅立叶的“法郎吉”社会，在财产关系方面，实行股份制。劳动者和资本家均可入股，甚至不惜以优厚股息来吸引资本家。法郎吉成员之间不存在商品交换，但在法郎吉内部存在统一供应消费品的商业，各法郎吉之间依然发生商品货币关系。法郎吉实行“按贡献分配”收入的原则。所谓“贡献”，不仅指劳动贡献，而且包括资本和知识的贡献。全部收入的 $\frac{5}{12}$ 按劳动分配， $\frac{4}{12}$ 按资本分配， $\frac{3}{12}$ 按知识分配。在这里，激励人们为社会多做贡献的动力不仅有物质报酬，而且有精神的因素，如竞赛的刺激等，并且，精神奖励将日益占据主要地位^①。欧文是一位较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在他所设计的合作公社里，没有给私有制留下任何余地。但是，在那里，至少公社与公社之间仍然没有取消商品交换关系。三大空想家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表明，在他们的主张中，不彻底性与现实性同时并存。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又注意到吸收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某些经济成果，没有忽视商品货币关系在新社会的作用，甚至在一定范围内主张给资本要素以一定的位置。这些都反映出他们比乌托邦主义的先驱们在思想上更加成熟，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① 参见《傅立叶选集》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3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因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科学比较。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科学地确定了评价经济制度的基本标准。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这就是说，一个社会形态或经济制度是新还是旧，是优还是劣，是先进还是落后，不是以这个社会的法律或意识形态为根据，而应当以这种经济制度对生产力起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为标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标准”。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般以人性或道德标准去批判资本主义，即使看到了资本主义破坏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现象，也未发现它同物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没有把生产力作为评价一切制度的标准来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所创立的“生产力标准”，把资本主义制度同未来新的社会制度作了比较，并得出新社会将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他们指出，新社会由于消灭了阶级对立和生产混乱，从而，能够使“大工业将来的发展规模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私有制下很难运用科技成就的农业“也会进入繁荣的新时代”，“社会将生产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3 页。

足够的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造就出全面发展的新人^①。其次，马克思指出了区分不同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志在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②。这种结合方式体现于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各个环节，而不仅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根据这一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再者，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在概念和范畴上把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区别开来，但已经在实际内容上把经济制度与其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加以区分。他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能理解。”^③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经济基础”显然是指经济制度，而现象上的“变异”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体制”。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系统而深刻地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时，不断地把它同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相对比，指出了它们的主要区别。这些区别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1）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制。前者是私有制，后者是公有制。公有制的形式可以采用国有制、合作社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2）就经济调节方式来看，前者实行商品经济，采用市场机制调节；后者实行计划经济，采用有组织的计划调节方式。在这里，没有商品价值插手其间，金钱将成为无用之物。（3）生产目的截然不同。前者的目的在于最大化的利润；后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2—22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4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892 页。

的生产则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4)在经济决策方面,前者由资本家或经理个人决策,后者则实行民主决策。“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①(5)在分配制度方面,前者按各人占有的生产要素来分配;后者则按劳分配,或进一步按需分配。(6)与此相联系,它们的动力机制也不相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物质刺激,主要是金钱刺激这一种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除物质刺激外,还有精神刺激作为激励人们劳动热情的动力。而且,到共产主义社会,精神刺激将成为主要动力。那时,劳动将会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7)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在未来的新社会将使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8)劳动力配置的自由程度大相径庭。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配置虽然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但由于旧式分工的存在,劳动者被终身束缚于一种职业,“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②在未来的新社会,教育使劳动者的才能得到了全面发展,无论从社会需要的角度,还是从劳动者个人兴趣和爱好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在各部门的配置都是相当自由的。(9)资本主义是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阶级和剥削。竞争也被联合所代替。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当然,上述九个方面,有的属于经济制度,有的属于经济体制方面的差别。这些差别也未必都符合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3页。

们今天的现实。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竟第一次在科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和未来新社会的经济进行系统比较。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以及对于未来新社会的天才猜测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经济所进行的比较分析（甚至还包括关于人类社会若干历史阶段的划分），并不意味着比较经济学的产生，但是，它们对于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思想脉络上的联系和深刻影响。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只为比较经济学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料，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则为比较经济学的科学发展奠定了指导性原则，并且，他们的某些理论分析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二）比较经济学的产生

比较经济学的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得很远，但它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只是在本世纪 30 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当然，它的产生也有个过程。最早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现代分析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和他的学生巴罗内。帕累托在其 1902—1903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体系》（*Systems Socialistes*）一书，以及 1906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作了对比。他认为，资本主义所实行的那种市场经济标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保留下来，虽然价格、利息等真正的实质意义将会消失，但为使生产最大化，又不得不借助于这些范畴以便核算价值。“否则，生产行政部门就会盲目行动，也不会组织好生产。”^① 社会主义“计划”不仅不排除市场，

^① 见 Z·皮亚尼奇：《东西方价格理论》，第 440 页。

而且可以同理想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达到同样的最优效果。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将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私有经济所固有的土地和资本租金的利益将转让给全体消费者。这就是说，市场经济形式是两种制度下共有的经济机制，而分配机制将有根本的差别。帕累托虽然指出了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但并未详细展开。第一个从理论上描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是巴罗内。1908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的著名论文。文中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配置方式作了对比。他批判了所谓以计划代替自由竞争就会导致财富的减少或消灭的理论，指出无政府主义的个体经济与集体主义的计划经济之间并无本质差别。它们经历着同样的运行过程，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他运用一般均衡的数学方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福利最大化，为达到这一目标，也需要寻求最低生产费用和建立费用与价格之间的均等关系，这可以列出一系列平衡方程式。在这里，又出现了自由竞争条件下平衡方程组的一切特征。这里虽然没有真正的货币和价格，但为了计算上的原因，必须在劳务与产品之间保持一定的等价关系，在这一等价基础上，劳动者把产品拿到公有商店以换消费品和使用国有资源的许可证，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是由其劳动的成果和集体支配的财富带来的效益决定的。至于积累，可采取刺激劳动者延缓消费的机制来进行，即管理部门必须给延缓消费者以一定的补贴，或者说给一定的利息。但究竟利息率多高为好，可采用试错法来确定，直至利息率对储蓄的刺激与社会对积累的需要量相适应为止。但这种集体主义模式的可行性如何，他没有明确答复。他只是试图运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根据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

济特征的预见，从运行机制方面对这个社会加以描绘。

1917 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设想和预见，而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上开始出现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就为经济制度现实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随着 20—3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形势的恶化，特别是 1929—1933 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加引起西方经济学家对两种制度比较研究的关注。因为，一方面，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使之不至于在危机中灭亡，需要攻击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资本主义自身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也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制度有无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1920 年，新奥地利学派著名代表米塞斯就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为题发表论文，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因为这里没有市场，从而缺乏经济计算的标准，而“没有计算，就不可能有合乎经济的活动”^①。当然，他的某些批评切中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端，但这是经济体制问题，不属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缺陷。他的这一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争论日渐激烈，终于形成 30 年代一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西方经济学家们同样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比较研究，但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以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为代表结成反社会主义一方。他们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私有制和市场，因而，不可能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哈耶克虽然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在逻辑上也可以合理计算，但实际上不可

^① 见《现代国外经济论文选》（第九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60 页。

能。罗宾斯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因为在缺乏市场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数学方法来进行合理计算，这要列出几百万个方程才行。然而，“到了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根据的信息已过时，需要重新计算它们。”因此，“实际上这种解法是行不通的”^①。以兰格、勒纳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方，以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为武器，坚决为社会主义辩解。他们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完全可以通过计划模拟市场的方法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在论证过程中，他们第一次提出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的这一理论当然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早在 1902—1903 年，帕累托就已指出，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恰好和“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果完全相同^②。1908 年，巴罗内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均衡方程可借助于“试错法”求解^③。泰勒在 1929 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一文中，则详细说明了这一“试错”过程。1936—1937 年，兰格根据辩论的需要，在发展帕累托、巴罗内和泰勒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发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系统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是如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得到运用，并且产生出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效果。除此之外，在辩论中还有第三种立场，即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的不可调和性。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多布。多布认为：“计

① 转引自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中译本，第 4 页。

② 见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81 年中译本，第 398 页。

③ 见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中译本，第 5 页、第 17 页。

划经济将有自己的规律……将有自己的经济会计和计算。”所谓计划模拟市场的模式毕竟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模仿。把社会主义生产建立在消费者主权，消费者自由选择基础上也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是生产者主权^①。

30 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为促进比较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刺激，并且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但是，论战毕竟不等于学科的形成。真正有意识地以论战为背景参与这门学科创立的是一批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和福利经济学家。1934 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 J·康芒斯发表了《制度经济学》一书，其最后一章为“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从经济理论、社会哲学和世界历史三个角度，对苏联共产主义经济，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经济，以及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对比分析。1937 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庇古出版了一本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专著。他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对于两种经济制度下的生产目的、资源配置的机制等进行了考察。虽然其立场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也有不少谬误，但其采用的比较分析方法和所考察的内容，对于比较经济学的创立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1938 年，美国经济学家 W·劳克斯和 J·胡特正式以《比较经济制度》为书名，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比较经济学教科书。迄今为止，比较经济学家所撰写的教科书大多采用这样的书名。该书把世界经济制度分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四种类型进行比较分析^②。这本书与此前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在经济比较

^① 见 Z·皮亚尼奇：《价格理论》，第 456 页。

^② 这里的“社会主义”指社会民主党建立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指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

的内容上更加完整，在体系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它的出版标志着比较经济学的初步形成。194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发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该书对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述可见，比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刚刚诞生的比较经济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采用“主义”分类法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所要研究的国家一律贴上“主义”的标签，例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种方法重在研究世界上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制度下的运行机制，忽视了同一经济制度下不同经济体制的对比分析。即使注意到了资源配置体制的多种形式的研究，也往往把体制和制度当作同一层次的东西平列和混淆。第二，比较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经济类型的差异和对立，很少涉及它们之间的共性和统一性。研究者很少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吸收和借鉴。第三，描述性多于理论性，显然早期的比较经济学还不成熟。

（三）比较经济学的发展

60年代以后，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越出一国范围，它在一系列欧洲和亚洲国家取得胜利。这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突破单一的苏联模式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以50年代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为开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到了60年代已相当普遍。同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国家也由于凯恩斯主义推行而日益脱离古典资本主义类型，呈现出各类不同的变种。这就为比较经济学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客观前提。

比较经济学家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主义”比较法，因为在“主义”概念下强调的是以所有制关系为重点的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或者把某些经济体制的差异硬性归之于两大经济制度的差别。这显然同新的实践的发展不相适应。不利于概括、总结、分析和研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大量的经济体制现象。西方学者于 1967—1968 年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许多学者呼吁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这种呼声得到普遍响应。60 年代以来的比较经济学研究已经日益把经济体制从经济制度中分离出来，并使之成为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由于体制与根本制度的区分，人们对于体制间相互吸收和借鉴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此外，在这一时期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也纷纷进入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它开始真正成为一门新兴的世界性学科。

由于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重大变化，比较经济学在理论上的进展是很明显的。最早从理论上系统论证“现代”比较方法的是 1971 年发表的 J·库普曼和 J·蒙台斯的著名论文《论经济体制的描述与比较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该文提出以“对具有特殊的经济功能的组织安排的比较”来取代“主义”比较法，并对经济体制与经济效果之间的关系以函数式的形式作出表述。

1976 年，E·纽伯格和 W·达菲合作出版《比较经济体制》一书，提出了一套新的经济体制比较分析体系。他们把经济体制看成是由决策、信息和动力三个基本结构构成的体系。虽然在体制的构成要素上学者之间仍存在分歧，但他们的这种结构分析方法却进一步促进了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化、系统化。1980 年，P·格雷戈里的 R·斯图亚特编写出一本《比较经济体制学》教科书，书中按照新的分析体系，把世界经济体制分成三种“纯

理论”模型，即资本主义体制、计划社会主义体制、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并选择若干主要国家为案例，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各种变体进行了比较分析。该书较全面地反映了近 20 多年来比较经济学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 1970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一书，对于比较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首次对于制度、模式和体制三个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并以国家、企业和家庭三个层次上决策权状态为尺度，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划分为集权、分权和市场社会主义三种模式。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以 1980 年出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而闻名遐迩。该书的突出贡献是采用非均衡方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经济体制的运行及其后果进行了系统描述和深刻剖析。他的另一贡献是，他从理论上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为四种模式，即直接行政、间接行政、无控制的市场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模式。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出发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也都推进了比较经济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各国普遍不承认一个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因而，不开展对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我国也大体如此，对于比较经济学很久都毫无所知。70 年代末，由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比较经济学开始传入我国，并逐渐取得长足进展。首先，翻译出版了某些在世界上有较大影响的比较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重要文献，向中国读者介绍和评述了许多比较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其次，在比较经济学领域，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研究。不少高等院校正式开设了比较经济学课程，在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已经或正在编写出各具特色的教材和教科书。在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一支专门从

事比较经济研究的学术队伍。80年代中期，还成立了全国比较经济学会，办起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模式的探讨，关于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和股份制的讨论，关于计划、市场、宏观调控等问题的论争等等，都对比较经济学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最后，无论是国外比较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引进，还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独立研究，都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二、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比较经济学产生至今，只有 50 多年历史，还不成熟。但它毕竟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应当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比较经济学”这一术语来自英文，它由“Comparative”（比较的）和“Economics”（经济学）两个词构成。但是，经济学领域很广，这门学科究竟以什么样的经济领域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呢？根据比较经济学家对于本学科研究范围的不同意见，以及他们的实际研究所涉猎的广度的差别，我们可以把比较经济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比较经济学对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经济政策等诸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比较经济学体系还有待于创造。本书所采用的比较经济学名称指狭义比较经济学，即比较经济体制。

比较经济体制是以两种以上的经济体制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

体制一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原指文学艺术作品的体裁和风